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话语融通路径研究

马忠,尚清清

(西安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710049)

摘要: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话语融通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如何让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在中国根深叶茂,如何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推进“两个结合”的客观要求。话语融通能够满足对话交流的文化需要、深层阐释的理论需要、激活创新的时代需要、面向未来的发展需要,可在基本表述、契合思想、深层结构和思维模式等不同层面展开,具体方法包括历史考据法、逻辑构建法、跨文化阐释法、语言分析法。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话语融通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3)05-0104-08

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①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代表着民族情感和民族文化的精华,其中很多词汇可以用来表达马克思主义。厘清这些词汇所处的语境及内涵,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话语融通,有助于马克思主义更好地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增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权。从根本上讲,话语融通解决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跨文化传播问题,目的是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分别“由‘原生版’转化为‘中国版’、由‘古代版’转化为‘当代版’”^②。鉴于话语融通是实现理论融通的先决条件,因此从语言学、阐释学角度入手,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推向一个新高度,显得尤为重要。

一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话语融通的深刻价值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③如何结合时代需要,以话语融通促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概念范畴、思想内容、思维方式、价值诉求、文化精神上的进一步启发、融合、阐释,是新时代推进“两个结合”的客观要求。其重要意义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 对话交流的文化需要

话语是人类思考的先决条件。实现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首先要实现跨语言交流,这是因为人类历史本来就是一个文化融合的过程。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开始,两者的结合就以中西文化交流的方式展开,行为系统、价值系统、思维特征、文化精神等方面的对话,都是建立在文本翻译、文化视角、思维方式的调整和拓展之上的。

话语融通的内在逻辑是跨文化交流。语言像

收稿日期:2023-06-15

基金项目:教育部专项重大课题攻关项目(22JDSZKZ11)

作者简介:马忠(1974—),男,甘肃通渭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①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

②徐奉臻:《“两个结合”的历史贡献及实践要求》,《哲学动态》2022年第11期。

③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

文化一样,很少是自给自足的。作为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语言会通过词汇、句法等形式,对跨文化交流产生深刻影响。马克思、恩格斯用以写作的德语、英语、法语等属于印欧语系,尤其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是用多种语言写成的,其中“56%是德文,33%是英文,6%是法文,剩下5%是意大利文、西班牙文、丹麦文等语言”^①,而汉语则属于汉藏语系,因此话语融通就成为跨文化交流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回到历史起点,中国人最早接触马克思主义时,一系列重要文本尚未出现中文译本,主要借助于日本、俄国的二手资料。据统计,“汉语借用自日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有56个,从日语中暂时借用,后来又被其他新词所代替的马克思主义术语有9个,中国未受日本影响而产生的马克思主义术语有1个”^②。其中唯物论、唯心论、认识论、辩证法等都是从日文翻译而来。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不仅是中西文化的简单对接,而是不断创造的过程,由此必然带来术语的本土化难题。由于语言的差异,是否能够完全达到对马克思主义的准确理解,是一个始终需要面对的问题。如《共产党宣言》中的“‘幽灵’一词的不同中文翻译先后有‘妖怪’‘怪物’‘精灵’‘巨影’‘怪影’‘魔怪’等,‘游荡’一词先后有‘徘徊’‘踟蹰’‘出现’等不同翻译”^③。另外,“‘辩证法’也存在争议,被译为‘辩演法’‘互辩法’‘矛盾法’‘对演法’等”^④。所有这些,充分证明话语融通的必要性。

(二) 深层阐释的理论需要

在对话交流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话语融通还体现在互相阐释上。阐释在西方文论中主要是一种思想批评模式。中国传统阐释则是以传、注、疏、笺为形式进行注释活动。马克思主义属于西方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属于东方文化,这无不要求话语融通要在多元文化

语境中综合运用中西阐释的方法。

阐释的目的并非简单的理解,而是新话语体系的构建。“任何科学理论和制度,必须本土化才能真正起到作用。”^⑤从这个意义讲,“马克思主义一旦离开与传统文化的结合,就不可能取得改变世界的成功效应”^⑥。例如,实现“唯物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经世致用”的互相阐释,有助于理解“实事求是”的思想根基。特别是要看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等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如何在科学社会主义视角的阐释下,转化为具有民族语言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新表述、新观点,显得尤为重要。

在这方面,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等善于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解读阐述马克思主义。“斯诺访问毛泽东时看见他很有兴趣地研读着马克思著作的中译本。不久后他就发表了关于辩证唯物论的讲话,并写出了《实践论》和《矛盾论》。”^⑦“据不完全统计,《邓小平文选》中所用典故约有362条之多。”^⑧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善于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阐释马克思主义观点,如把党性教育比喻为共产党人的“心学”^⑨,等等。

阐释还可以在相互交流的理论空白之间构建一座桥梁,从分析性和人文性相结合的视角,帮助填补彼此的理论空白。为此,我们要站在文明互鉴的历史视角,充分运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研究成果,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历史进行科学阐释,从而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继承好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总之,我们要特别重视把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

(三) 激活创新的时代需要

“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⑩马克思主义和中

①王海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经典著作编译与传播研究(1919—1949)》,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6页。

②李博:《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从词汇一概念角度看日本和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赵倩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4—413页。

③徐素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MEGA²视野下的文本、文献、语义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0—51页。

④徐素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MEGA²视野下的文本、文献、语义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84页。

⑤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3页。

⑥张明:《以历史的眼光审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现代哲学》2020年第2期。

⑦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刘尊棋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299页。

⑧裴传永:《邓小平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版,第94—95页。

⑨牛安生:《“心学”对共产党人党性修养的当代启示》,《中州学刊》2017年第9期。

⑩《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8页。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话语融通还有助于实现两者的创新发展,构建中国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如全球化对唯物史观的研究提出了新课题,包括机遇问题、跨越问题、创新问题、现代性问题、代价问题。解释上述问题,不能单纯运用现成理论,更不能为西方理论做注脚。相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很多思想具有很强的解释力。

当代是历史的延续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①激活创新的核心是用马克思主义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转型提供新视野、新方法、新动力、新领域,使某个传统命题或范畴在现代意义上激活,促使其在他者观照中达到新的自觉^②。如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交往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天下”理念相结合,有助于提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基础。

“激活”是一种双向互动。激活创新来源于两者思想观念、价值理念的融通。如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与中华民族天下为公的精神追求相契合、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与中华民族强调的经世致用、知行合一有相通之处。但是也不宜简单地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直接拿来作为社会主义文化的现成组成部分,还应当经过“激活”“熔铸”“转化”,调试认知框架,实现视角融合。这样一来,不但可以做到传统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而且使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的某些思想得到重新反思。

总之,话语是反映时代精神、文化和思想的重要形式。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人类文明的共同表现形式,虽然在哲学层次上有着共通或者相通之处,但毕竟属于截然不同的两种文化。因此在话语表达上有很多不同之处,尽管过去我们在两者的融合上取得了很大成就,但还有很多认知距离,只有不断话语融通,才能构建两者真正的亲密关系。

(四)面向未来的发展需要

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话语融通要面向未来发展需要,因为话语融通创造的新概念、

范畴、词汇、语句是未来发展趋向的重要窗口、风向标。话语是一个文学、语言学问题,也是一个哲学、传播学问题。“它关乎个人、社会、民族、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的存在方式。”^③因此,话语融通必须深刻反映未来发展的需要。由于话语的表述承载着人的意识、思想、思维、价值观等,不同的表述会影响话语的穿透力和说服力,因此在推动文化转型与创新的过程中,将两者价值体系相结合,是实现21世纪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重要途径。

即是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话语融通会产生一系列鲜活新颖的“话语族群”^④、词汇、短语,如党的二十大报告将“两个务必”提升到“三个务必”,增加“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这一崭新话语,告诫我们面向未来必须保持这样的精神状态,使之转化为我们赢得未来要付出的实际行动;进一步提出、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等标识性、原创性的关键核心概念,强化了中国对概念的生产权、定义权、解释权和使用权,为中国乃至世界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进一步分析,话语融通是在对人类历史和现实批判分析的基础上进行构建的,本身包含了未来维度,两者相融通能够挖掘新观点、发现新问题、构建新理论。从信息论的角度看,话语信息流包括“活性信息、半活性信息、非活性信息”^⑤,即已经激活的信息、半激活的信息(可推知信息)和没有激活的信息。话语融通不但是现有信息的交流,还可以发掘半激活的信息和没有激活的信息。进入新时代,打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思想精华,不断推陈出新,为进一步提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提供文化土壤和理解框架,对新时代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给出马克思主义的解答。

二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话语融通的主要方式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话语融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40页。

②朱丹:《习近平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论述的形成理路和实践要求》,《理论探讨》2022年第1期。

③陈曙光,陈雪雪:《话语哲学引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

④李桂奎:《中国传统写人理论之脉络及其谱系性》,《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⑤陆俭明:《再议语言信息结构研究》,《当代修辞学》2022年第2期。

通,表面上看属于语言的形式层面,实则是以形式推进内容层面的融合,两者融通的方式体现为四个方面。

(一) 基本表述的话语融通

话语是最重要的交流形式。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话语融通的最浅层要求,是实现哲学概念和核心词汇的通约。如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主客体关系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体现为心物、心身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方法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体、用”有异曲同工之妙。再如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范畴,可理解为中国的“宇宙”。中国古代战国时期的尸佼在《尸子》中曰:“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来曰宙”。“宇宙”是时间和空间的统一,在空间和时间上分别可以无限扩展和延续。

从中可见,中西文化对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的思维等关注点上,可以发现很多共同指向。这样的例子很多,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阴阳”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心”与“意识”;“民”与“人民群众”;“行”与“实践”;“知”与“认识”;“变”与“运动”;“新”与“发展”;“名”与“形式”;“实”与“内容”;“象”与“现象”;“色”与“感性”;“义”与“原则”;“利”与“利益”;“群”与“集体”……打通了这些词汇,可以打破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文本阅读障碍。

值得说明的是,在具体的语言处理中,必须要重视词语的筛选,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与“宇宙”接近的表达还有“天地”“乾坤”“六合”,但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世界”概念最直接的对应词汇无疑是“宇宙”。另外,还要注意词汇的文化语境。比如“气”这一概念,虽然在先秦已经有了“气本论”说,与马克思主义的物质统一性很接近,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无论是地、水还是气,仍然是一种具体物质。马克思主义的物质本体则包含了实践活动,并非直观的感性物质。

实现了基本表达的话语融通,可以赋古语以今意、探今语之古源。如将“意识”和“心”对应,就可以仔细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感性、知性、理性、情感、理想、价值”等,如何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心智、良心、决心、心欲、爱心”等不断对应,

在此基础上实现不同语言体系的沟通。

(二) 契合思想的话语融通

如果说基本表述的话语融通是符号层面的通约性,契合思想的话语则是进一步从思想深层进行衔接对话。“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①主要是两者具有很多契合思想:物质观与传统气学、矛盾观与阴阳互动、运动观与革故鼎新、发展观与生生不息、实践观与知行统一、群众观与民本思想、主观能动性 with 自强不息、集体主义与天下为公、共产主义社会与大同世界、解放全人类与济世情怀……再如,朱熹关于“万个是一个,一个是万个”的命题类似恩格斯所提出的“一与多”的命题。另外,中国传统哲学在对运动、变化、联系、矛盾、转化、内因、对立统一、个别一般等关于辩证法的基本观念上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体一致^②。

虽然上述方面在思想上高度契合,但在语言符号的表达上有很多差异,因此要反复选择最接近的词汇和本土化符号,如毛泽东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马克思主义精髓表述为实事求是。另外,还要进行本土转换、调适、规范等话语方法。如马克思主义的“规律”一词,需要从“道”“理”“势”“天”等多个方面进行展开;而中国传统哲学的“道”,同样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规律”“逻辑”等不同层面进行阐释。“实践”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有“格物致知”“习”“躬行”“践履”等多种表达,而“知行合一”最为接近。再如对唯物史观的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理势合一”的思想,“所谓‘理势合一’是指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是统一的”^③。还如马克思主义中的“质”“量”和传统文化的“理”“气”非常类似。总之,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在于文化精神的相通,只有在精神层面相通,才能超越传统、实现转型。

(三) 深层结构的话语融通

任何一种语言都具有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深层结构的话语融通是一种由外到内、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深度结合,即指通过激活半活性信息

①习近平:《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求是》2020年第1期。

②袁久红,郝娜:《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儒学价值论》,《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③陈方刘:《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6页。

而进行的话语融通。深层结构的融通强调话语的内在关联和深度意义。语言的发展离不开深层结构理论的思想养料,它为语言形式和意义的对应开拓了广阔的研究领域。因此,离开了“深层”信息,语言结构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论点虽然相近,但在深层结构上有很多差异,需要在比较借鉴中综合二者之长,相互补充,帮助填补彼此的理论空白,从而达到全面的认识,在话语融通中实现思想提升。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语境中的“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论点并非一一对应的关系,其根本原因在于深层结构的差异。从根本上讲,马克思主义属于唯物史观的理论体系,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则侧重于从仁学、心学的视角构建体系。所以实现深层结构的话语融通,关键在于对双方相似的观点进行反复比较,在差异中找到弥合性。

再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没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马克思主义论点,但其中很多表述都展示了类似的思想。例如“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民无恒产则无恒心”等,无不体现了经济基础的重要性,即民生、民产、民力等经济要素对民心等精神因素的决定作用。类似表述都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社会政治与经济基础关系等重要问题的思考和认识,挖掘这些丰富资源,对于推动两者深层结构的话语融通具有重要的启迪和指导意义。

需要强调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许多话语蕴藏着全新的表达方式,它们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这些话语不仅源于历史,同时具有现实和未来的含义。我们需要通过话语融通,深层发掘两种文化的共性和优势,通过半激活的话语,带动整体话语的激活,从而构建全新的理论框架和词汇体系。

(四) 思维模式的话语融通

思维模式的话语融通本质上指非活性信息的话语融通。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话语融通最深层是思维模式、世界观及价值观的融通,思维模式“包括思维形式、思维方法、思维路线、思维顺序及思维倾向等基本要素”^①,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文化背景、观察角度、思维模式的不同,进而产生话语表达的不同。因此,要从思维模式入手创造新的话语空间。

语言的表达是受思维方式支配的。马克思主义所秉持的论证性思维,致力于将事物的话语概念层层剥离,以此达到对事物本质与规律的真正理解,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则强调对事物的整体思考及直观感悟。由于在话语知识质态、话语谱系结构、话语思维空间和话语表达方式等方面,两种话语存在根本性的差异,因而在话语转换过程中产生了新意义。“融通”的思维模式否定了所谓“唯一正确”^②的存在,目的是在合而不同中进一步实现思想和观念的融合。因为话语构建中的一个词、一个语言体系的用法范围永远是开放和变动的。语言和意义之间存在着差异性和张力,可以通过凝缩、移置、暗喻、隐喻等路径曲折的方式表现出来,从形式和内容上表现出新的话语形态。虽然两者思维模式不同,但“异不掩同”,两者不管有着多大的差异,总还存在着这样和那样的共性。历史已经证明,从两者开始相遇,在许多重要问题上已是水乳交融、难分彼此,在相互接触磨合的过程中,自然能够相互渗透以至交融会通。

两者话语融通的前沿问题主要在于创造全新的语言空间,促进相互渗透、融合共生,从而形成重要的理论推动力和实践引领作用。此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许多词汇和术语在西方文化中缺乏恰当的对应词语。话语融通可以为中国话语的国际发展提供正确的意义范本,以减少跨文化传播中的意义流失和失真。

三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话语融通的科学方法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话语融通的实现离不开科学路径。因此要有一套自己特有的表达、沟通、解读的学术规则,循着“‘返本’与‘开新’”^③相统一的道路,准确把握并全面阐发两者融通的科学方法。

① 闫文培:《全球化语境下的中西文化及语言对比》,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4页。

② 邵敬敏:《汉语语法研究的战略思考》,《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③ 张分田:《“返本开新”刍议》,《天津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

(一) 历史考据法

“考据法是研究历史、语言等学问的一种实证方法。它主要通过搜集资料和证据,加以鉴定与分析,运用排比、分类、归纳、演绎等逻辑推理方法,判定事件、材料的真伪与是非,推求和印证某一现象与结论。”^①其中历史考据是最典型的方法,具体包括比较考证法、求源考证法、推理考证法、存疑考证法等。将这一方法运用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话语融通研究,就是实事求是、广征博引、精准细致地分析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实现本土化过程中的话语碰撞、对接、融合,梳理两种文化和话语体系不断对话的生成脉络,包括基本概念、核心判断、重要文本的不断理解和视觉融合,要厘清这些概念、范畴、命题、理论框架如何被激发、探索、选择、替换、使用,进一步找到两者话语融通的基本规律,最终目标是“从现在和未来的问题(视角)出发,研究、探讨过去东西本身的意义及其对于现代和未来的意义”^②,从而为实现更好地结合做好历史指引。

为此,在历史考据过程中要注重梳理两者话语源流的历史演化脉络。从历史视角看,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话语互动大致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是以传统话语去认同、比附、解释马克思主义的。第二阶段大致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到革命战争结束,马克思主义话语开始适应民族土壤,之后两种话语初步走向融合。第三阶段为建国初期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两种话语对立多于和谐。第四阶段为改革开放以来到新时代,两种话语进行了深度融合,探索建立了统一的话语体系。第五阶段为新时代以来,两种话语如何从人类文明新形态高度进行新的融合,在话语融通中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根源,成为新的时代课题。

在此基础上,要深入分析两者话语融通的历史发展规律。“语言发展的规律就指的是这一套符号系统在历史过程中怎样地变化或扩张,朝着什么方向变化或扩张。”^③而话语融通的发展既与民族的演进历史、发展方式相联系,也与既有的历史进程所表征出的文化传统密切相关。两者话语

融通的理论基础根植于五千年浓缩的文化积淀,并体现在时代发展和人民要求等方面。

(二) 逻辑构建法

逻辑构建法即运用逻辑推理、科学归纳等方法进行思想体系的构建。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话语通融,表面看是在打通话语,实则是构建一种“超越”两者、本土化的具有创新性的逻辑体系,是在“结合”中生成更加丰富的知识内容,因此需要遵循科学的逻辑思维进程。这是因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逻辑体系上的相通是一个复杂而有挑战性的任务,因为它涉及不同文化和思想体系之间的对接和融合。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现代思想体系,强调社会历史的辩证发展,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往往根植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和价值观念,两者在历史和社会发展观、人性观、社会公平与正义、人类共同体、自由与解放等方面有很大的启迪空间,逻辑构建有助于提供理论创新的基点。

运用这一方法,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厘清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话语融通系统语词概念的差异,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这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基本要求。另外,逻辑构建的过程中要保持批判性思维,并非简单合并两者,而是在寻找相通点的基础上进行深入反思;更要认识到两者之间存在的差异和矛盾,在差异的基础上尝试进行对话与融合,借助哲学、社会学、文化研究等学科,在两种思想体系之间建立桥梁,找到交汇点,形成一种更加包容的新话语体系。

需要强调的是,逻辑构建要以理论和实践问题作为出发点,防止简单抽象和逻辑循环。即关注人类面临的各种问题,因为这些问题从根本上推动了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创新和发展。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话语融通,要明确目的是解决什么理论和实践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如何通过思考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哲学观念、理论、用语的融合中回应根本性的时代课题,最终实现理论创新,从而科学地回答中国之问、世

①王宏斌:《历史考据法探源》,《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3期。

②柴方国:《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考据词典〉》,《国外理论动态》2000年第1期。

③高明凯:《语言论》,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438页。

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三) 跨文化阐释法

跨文化阐释是一种旨在建立文化联系和相互理解的沟通策略。它要求个体从他者的文化背景和视角出发,放弃对自身文化的固有立场,充分利用“前理解视域”^①进行有效的沟通和信息传达。从文化视角出发,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分别属于现代和古典思想体系,只有跨文化阐释才能找到来自不同文化背景、土壤、场域、语境、基因、心理等不同时空平行思想理论的共性。

运用跨文化阐释的目的是生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生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阐释学”需要理解阐释学的两个视角。西方阐释学强调解释的意义和相关活动,包括探究问题的字面意义和隐喻意义。而中国传统阐释学关注历史维度和多种解释方法,如音韵、训诂、文字考释和义疏等。在借鉴西方阐释学的同时,我们不能把其框架强制应用到中国阐释学的经验和思想中。相反,应该以中国的历史和国情为基础,认真提取、归纳、整理和改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学资源。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出发,借鉴西方阐释学方法,提出和构建适应中国发展的概念、范畴、命题和话语体系,以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

在跨文化阐释的具体方法层面,汉学家于连提出“迂回进入的方法”^②很有启发意义。所谓“迂回进入”,在理念上就是通过“迂回”真正达到“以中释中”,在策略上就是“曲折式前进”,即以中西互为中介,目的是避免直接的冲突,用“他者”“猎奇”“反复求证”“间接旁观”的方法避免话语内部发生裂缝,用一种话语转用另一种话语,重视“奇”之运用。例如从两者比较中展开隐喻意义的阐释,找到隐喻信息传递的相似性替代机制,可为两个不同文化语境下的信息传递提供一种“桥梁”。

(四) 语言分析法

要了解语言分析方法,首先要了解“话语分析”的内涵。语言学家布朗和尤尔认为话语分析就是“对使用中的语言的分析,它不仅仅是探索

语言的形式特征,更是对语言使用功能的研究”^③。一般认为,语言分析就是通过对在一定语境中语言本质、功能、性质、形式和结构的分析,揭示语言规律的过程。这一方法注重分析“结构”“语义”“语境”“意义”等方面,目的是使语言运用以一种非常清晰的方式呈现出来,在话语实践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话语融通中运用语言分析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语言的结构主义分析。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两个关键概念是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④。语言的表层结构涵盖了多样的语言现象,涉及语言的实际应用领域;语言的深层结构则指其运作方式及深层的意义。运用结构主义方法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话语融通,核心是注重逻辑和词语分析,因为逻辑和词语分析是语言形式间相互关系的总和,两者的融通要从话语形式过渡到内容层面。

二是语言的语境分析。“语境指一切影响话语结构的生成和语义理解的语言和非语言要素的总和。”^⑤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话语融通,必然涉及社会、政治、文化、时代等丰富语境,因为同一个词汇或者是同一句话在不同语境之中是不同的,话语意义会随着语境变化而发生相应变化。由此可见,根据两者各自的语境,形成共同的所指,从而达成一致的理解,是话语融通的必然要求。

三是语言的意识形态分析。语言被认为是一种具有社会构建的力量。意识形态只有借助语言才能实现出来,否则将是一个空洞符号。一般而言,由话语冲突达成话语融通,需要深刻揭示话语背后的权力关系网络、意识形态差异、底层结构叙说故事,这样才能寻求利益诉求的一致或者可接近性,实现“差异中的同一”^⑥。同样道理,在差异中寻求关联,把异质性要素结合起来形成合力以促进在多层和多元的价值取向中确立马克思主义主导价值方向,也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

①郑艳艳,文成伟:《现代技术伦理的诠释学阐释》,《自然辩证法研究》2020年第5期。

②邹元江:《“迂回”何以提供“进入”?》,《河北学刊》2021年第3期。

③范宏雅:《近三十年话语分析研究述评》,《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

④龚晓斌:《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理论的跨学科研究》,《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年第1期。

⑤王冬竹:《语境与话语》,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3页。

⑥景君学:《本原与延异:德里达差异哲学中文字对语言意义的游戏建构》,《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

文化话语融通需要关注的方面。

结语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历史文化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从对话交流、深层阐释、激活创新、面向未来等多个层面看,两者的话语融通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重大的实践问题。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话语融通,有助于让马克思主义更好地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推进“两个结合”。从基本表述到契合思想,从深层结构到思维模式,

两者的话语融通必须是全方位、整体性的。两者的话语融通“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①,需要在互相吸引和渗透中进行调整、转型、反思和改铸,寻找两者话语交汇和差异点,对文化符号进行本土化转译,对此要全面运用历史考据法、逻辑构建法、跨文化阐释法、语言分析法。所有这些都充分说明:如何在跨文化传播和本土化转型背景下,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融通中激活思想、创新话语、整合提升、注入动力,是新时代思想文化建设的重要课题。

On the Integration Path of Marxist Theory and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Discourse

MA Zhong & SHANG Qingqing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49, China)

Abstract: The integration of Marxism and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discourse is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ssue. How to make the tree of Marxist truth take deep roots and flourish in China, and how to creatively transform and innovatively develop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s an objective requirement for promoting the “two-way combinations” in the new era. Discourse integration can meet the cultural needs of dialogue and communication, the theoretical needs of deep interpretation, the innovative needs of activ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needs for the future. It can be conducted at different levels, including basic expression, ideological compatibility, deep structure, and thinking patterns. Specific methods include historical textual criticism, logical construction, cross-cultural interpretation, and language analysis.

Key words: Marxism;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discourse integration

(责任校对 葛丽萍)

^①《深刻理解“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23年6月7日。